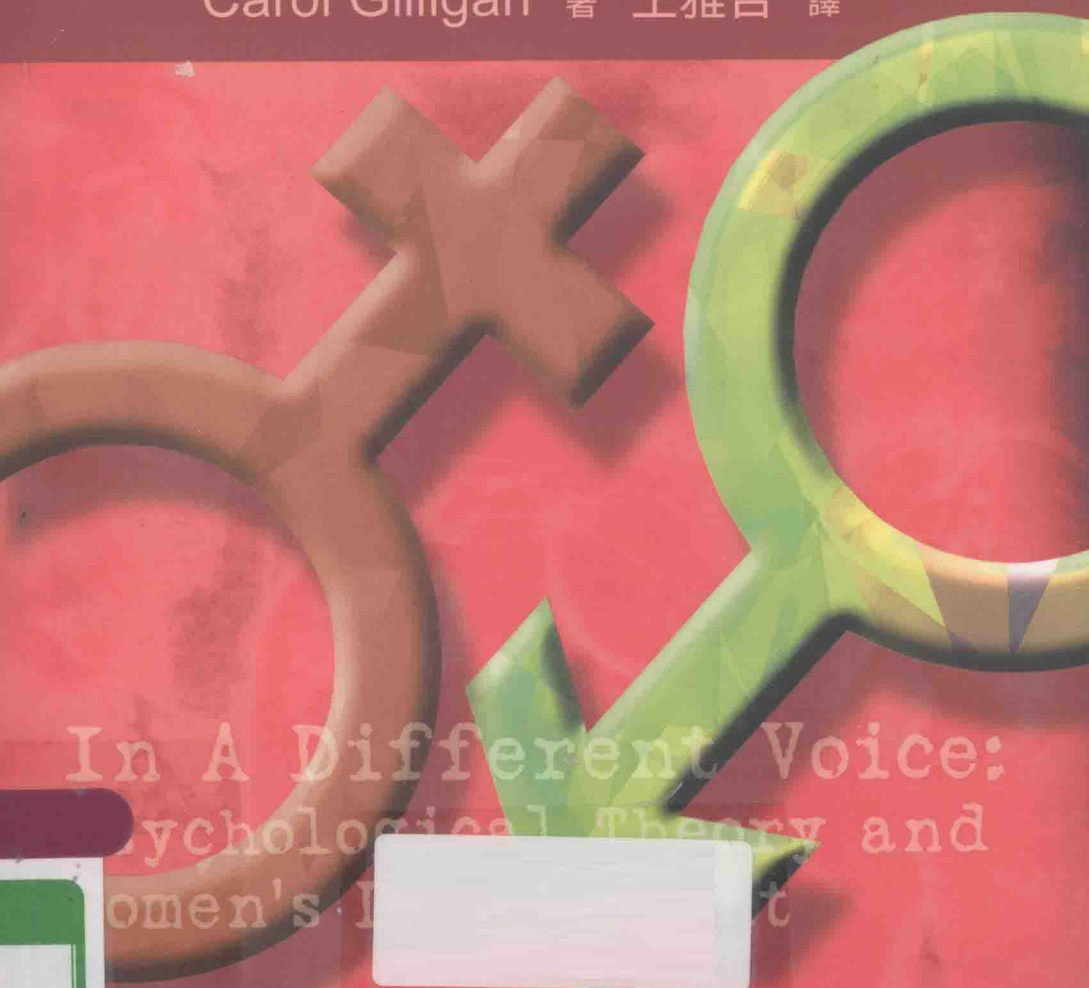


不同的語音

心理學理論與女性的發展

Carol Gilligan 著 王雅各 譯



心理出版社



王雅各 譯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不同的語音：心理學理論與女性的發展 /
Carol Gilligan 作；王雅各譯 -- 初版. --
臺北市：心理, 2002 [民 91]
面；公分. -- (性別教育；4)
譯自：In a different voice :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
ISBN 957-702-531-5 (平裝)

1. 婦女 2. 婦女—心理方面 3. 發展心理學

544.5

91015997

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

Carol Gilliga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Copyright ©1982, 1993 by Carol Gilligan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譯者簡介

王雅各

學歷

美國芝加哥羅耀拉大學社會學博士

現任

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專長

社會學理論、性別研究、媒體與文化批判、藝術社會學

著作

臺灣男同志平權運動史。臺北：開心陽光出版社，1999。

臺灣婦女解放運動史。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99。

性屬關係。臺北：心理出版社，1999，編著。

文明化的儀式：公共美術館之內。臺北：遠流出版公司，

1998 譯，原作者 Carol Duncan。

藝術的魅力重生。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8 譯，原作者

Suzi Gablik。

譯者序

當我在鳥語花香、春光明媚的北卡大（當然是相對於冰天雪地的威斯康辛）安頓下來的時候，卡若·吉利根的書《不同的語音》才熱騰騰的剛出爐。辦完註冊逛書店時我就買了赴美留學之後的第一本「閒書」。夾著雖然被當兵扼殺得幾乎蕩然無存（原先是強烈狂熱的）對心理學的興趣，我簡直就像是看武俠小說似的看完了這一本書。平心而論，那時充其量只是在字面上理解《不同的語音》。

碩士班第二年被符號互動論附身，修了兩門相當於社會心理學的課，第三年結束時甚至很認真地思考唸臨床、諮商或教育心理。現在看起來碩士班的許多事，至少間接的都和《不同的語音》這本書脫不了關係。再次想到卡若·吉利根已經是博三開始寫論文時。做田野調查的過程中，一再地遇到女性學生運動員在理解和表達社會運動上（與男性學生）的不同，也讓我有機會去深入思考卡若·吉利根所討論的有關「公平」、「正義」、「關愛」、「責任」及「權利」概念上的性別差異。

回國的前九年做的全都是攸關性別（主要是婦女）的研究。所有的英文文獻中都陰魂不散的瀰漫著——以各種方式——「本質論」對「建構論」、「生理」對「心理或文化」、「相同」對「差異」、「一元」對「多元」的各種論辯和討論。在那段日子裡，我非常真心的期望（等待著）台灣的心理學界能夠翻譯並且討論這本書。



然而升等之後緊張的情緒久久無法平復，妻建議我帶著孩子去度個暑假。整理行囊時莫名其妙的帶了這本書，帶著孩子去哈佛又巧遇了以前的大陸同學，她告訴我肖巍在一九九九年已經把這本書譯成中文簡體字版。這個消息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二〇〇〇年的春天我開始著手翻譯《不同的語音》。

我認為卡若·吉利根的這本書是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心理學界中最重要的一本書（或者之一）。她從人們的常識性理解入手，以科學的方法建立了一個嶄新的論述：與男性相較，女性有著不同的發展途徑。不僅如此，在提出此一論點的過程中，卡若·吉利根以充分的論據極有說服力的指出以往有關人類發展的理論是以男性為基礎（和中心），因而是性別盲的。同樣重要的是，《不同的語音》並不是以推翻男性的經驗為論據，它反而是主張——在指出了傳統觀點的缺失之後——以含括女性生命週流經驗的方式為基礎，而建構一個更為完整和全面理解人類發展模式的企圖。

就這樣的目標和進行的方式而言，卡若·吉利根的這本書可以被視為是女性主義知識論建立的典範。其實在翻譯的過程中，我一再地回到我自己在台灣的成長過程，並深刻的體認了此地在此社會化女性和男性中與美國社會的相似之處。

初識此書時，正是我結束一段感情的前夕，而回國之後結婚、為人父等經歷又讓我對教養孩子有了份外深刻的體認。記得二〇〇一年的暑假，有幾次當我坐在波士頓西郊姊姊家中的起居室望著屋外的草坪斟酌著不同翻譯字眼時，想到了我教導兒子的不同方式，以及他在社會中所遭遇的強大壓力而潸然淚下。我相



信真正的學術該是被落實在日常生活之中的。

很高興在此書問世的二十週年時我能夠完成翻譯。我也誠心的邀請國內的心理學界和一般讀者，針對這本書做各個面向的討論。甚至我期望能有本地的學者能夠做一個和吉利根一模一樣的研究以便和《不同的語音》對話——或者批判傳統心理學中的男性偏見。

這是到目前為止，我所翻譯過篇幅最短但耗時最久的書。我要感謝妻的支持和鼓勵，兒子易恆的忍耐和包容；研究助理蔡雲威幫我做了品質絕佳的文書處理。此外，農曆年前過世的岳母在生活上給了我很大的支持和援助，我常覺得她就像是吉利根筆下最典型的女人。這本書——如果翻譯也可以被稱／視為創作的話——用來紀念她和所有心地善良、用心過生活、努力維繫（和建立）人際關係的女人和男人。

王雅各於家中

二〇〇二年三月八日



致讀者的信（1993）

我在一九七〇年代初期，也就是第二波婦運出現的時刻開始撰寫《不同的語言》。當我告訴現在的大學生於一九七〇年春天在反越戰抗議示威的高峰時有肯特州立大學（Kent State University）的學生被國民兵（National Guard，亦稱「美軍」）射殺，因此導致當年的哈佛大學取消了期末考也沒有舉行畢業典禮的情形時，學生都覺得難以置信／不可思議。在那當頭學校裡的活動戛然而止，而知識的基礎也面臨了一個重新的檢驗和質疑。

一九七三年，美國最高法院在露對威德（Roe v. Wade）判例中判決墮胎合法化，在此同時也暴露了支撐男、女及親孩關係的觀點。當最高法院視女人擁有為自己發聲，及賦與女人在牽涉到攸關生死責任人際關係中複雜事項／議題的合法決定權之後，許多女人開始察覺到影響她們訴說能力的一個內在聲音力量。那個內在的或者被內化的聲音告訴女人說：把自己的聲音帶入人際關係是**自私的**，也許她並不真正知曉自己需要什麼，或者她的經驗在思考該採取何種行動方針時並沒有提供一個可靠的指引。女人往往感知到去說甚至思索她們自己在想什麼、要什麼是危險的——會讓別人不高興也因此有可能威脅別人放棄她們或者報復。在我研究的關係脈絡中，和女人的對話為保密的協議所保護且尋常的權威結構，被我以向案主學習的方式所逆／倒轉，許多女人在那些艱辛和困苦的情境裡其實知道怎麼思考和怎麼做會對她們自己最好。但許多女人卻擔心若說了，別人會譴責或者傷害她們，



也許別人無法傾聽和理解、顧慮訴說之後甚至會讓自己更混淆／亂，因而保持看起來像是**無私無我的**，放棄自己的聲音以保持平和的人際關係。

一位女研究生某天在口試中說道：「若為自己代言」——然後她就停了。聽到失聯的聲音——在她自己和她所說的話之間的分離，她開始質疑她與她所說和沒有說的話之間的關係。她在對誰說話，在和自己的關係上又是身處何處呢？在露對威德案後許多女人公開地質疑屋中天使的道德觀——詩人派特摩（Coventry Patmore）所提出十九世紀的不朽女性神祇偶像：那個只為別人發聲和行動的女人。藉由在人際關係中默不吭聲的後果經驗裡發現——無私無我行為所導致的麻煩——女人以一種不朽的方式曝露天使的道德：放棄發聲，並從人際關係和責任中逃逸。天使的聲音是個維多利亞時代的男人透過一個女人的身體所發出的聲音。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體認到，如果她想要以書寫來彰顯女性在沉寂偏誤的女性聲音，以使自己能夠發聲的的話，她必須和此天使奮戰。

就是這發聲的選擇引起了我的興趣。女人發現，勉強自己無私無我以便建立人際關係的問題，在解放女人的聲音以及從而知道女人所明白（的知識）是很重要的。那有點兒像是看到表象之下的深層，或是讓潛藏在人類對話中的伏（暗）流浮到表面上來：什麼是已知的，什麼是未（不）知的，和那些感覺到但並沒有被說出的。女人選擇不說／保持緘默／或甚至將自己和所說的話語分開，有可能是刻意的或是不知不覺的，有意識的選擇或者藉由縮減連接呼吸、聲音的話語通道，在腦海中保持著一個高的



音調以使它不致於攜帶深刻的人類情感／緒，或者情感和思緒混合，或者以聲音改變得用更為保留的或非個人的音調交錯的運作並由身體所啟動的方式完成。女人選擇保持沉默通常是顧慮到她／他人的感受，和自己與別人生活現實性所促發的心理保護作用和良善意圖。然而在限制自身的聲音中，許多女人自覺或不自覺的就強化了那建立在與女性失去連結的男性語聲和生活秩序的文明當中。

從艾瑞克森（Erik Erikson）那兒我學到了妳無法將生命／活從歷史中抽離，生命史和歷史、心理學和政治是夾纏不清的。傾聽女人，我發現了差異和替女人在心理學上與歷史上所帶來／導致的生命／活改變。它事實上改變了聲／語／話音：人的故事是怎麼被訴說以及是由誰在敘述的。

現在，在距離我開始書寫《不同的語音》之後的二十年，我發現自己和這本書在一堆積極、生動和往往善意的有關女人聲音、有關差異、有關於知識的根基，或者是現在被稱為是有关女人和男人以及她／他們與孩子之間關係的正典討論當中。在心理學中這些問題導致了對於研究方法、心理評量和心理治療在應用上一些極為嚴肅的重新思考。而在教育的領域裡，這些問題則是激進、前衛且改疆闢土的。對於那些有著和我截然不同生活／命經驗的人和在相當不同（學術）領域活動的人，我學到了以嶄新的方式去傾聽我自己的聲音。舉例而言，身為心理學家我認為人們在身體、家庭關係、社會與文化位置會對她／他們造成影響是理所當然／不言自明的。傾聽法律學者，特別是敏開（Martha Minnow）在她《造成差異》（*Making All the Difference*）的書中



所言，讓我逐漸理解迥異於討論或理論化差異的說詞，和明白為何有些人在法律補救措施提及差異時是吞吞吐吐／猶豫不決的。

我也在朵渥金（Ronald Dworkin）最近在《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une 10, 1993）中所發表的文章〈女性主義與墮胎〉（*Feminism and Abortion*）中聽到了知音。布蘭基（Mary Belenky）和我所訪談的女性主義法律學家的研究導引了朵渥金——在本書第三章和第四章所記錄下來的女人們的聲音。二十年之後的書寫，他也深深地被當時我覺得很震撼的東西所驚訝：這些女人聲音之間的差異和大眾在墮胎爭議上所使用的術語（**有關於權利和謀殺尖聲喊叫的修辭**）。仔細傾聽青春期和成人婦女的聲音，他發現它們是發人深省的，因此他也得到了在我當時得到時顯得激進和很難自圓其說的結論：「決定是否墮胎並不是一個失聯於所有其他決策的特別問題，而是一個人在一生中必須有所抉擇的戲劇性和惱人的決策案例。」

在《不同的語音》出版之後，有許多人和我談到了她／他們的生命／活、婚姻與家庭、離婚、工作、她／他們的人際關係和孩子們。我也很感激那些由我從來沒去過或者沒辦法去的地方寄給我信、書和文章的人們。她／他們的經驗、不同語音的案例以及她們的理念，常常以極富創意的方式複雜化了我所書寫的文本。在此期間我也和在哈佛有關女性心理學與女孩發展計畫中的布朗（Lyn Mikel Brown）、羅傑斯（Annie Rogers）和其他成員們共同工作。在此計畫中，我們試著連結女性心理學和女孩的聲音，以便使心理學能夠發展出一種新的聲音——就如吳爾芙在一九三〇年代所說的「找出新的詞彙和創出新的方法」表示了期許



女人的生活／命、教育以及她們的進入專業（職場）能夠打破暴力和支配的歷史循環。在努力邁向此一願景時，我覺得和米樂（Jane Baker Miller）的研究非常投緣，並且從她極激進的洞見：「女人的情境是了解心理（學）秩序的一個重要關鍵」中得到激勵。

當我持續地探索在政治秩序、女人與男人生活／命心理學間的連結時，我益發地察覺女人的聲音在維繫或轉化父權社會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藉由積極涉入此轉變過程，我發現自己和這本書成為一個心理學和政治學熱烈爭議的核心，在其中清醒／正常和權力是舉足輕重的。

在傾聽人們對於《不同的語音》的反應時，我經常聽到一個自己在書寫時一再經歷的兩個步驟：以一種不同的陳述方式，傾聽女人並覺得有些新意，然後快速的此一差異順應入老的類屬式思考因而失去了它的不同和訊息：這是自然還是文化？女人比男人較好或較差？當我得知我的研究是被以是否女人和男人是真正的（本質的）不同或者誰比誰好的語言所架構時，我就知道我失去了自己的聲音，因為那並非我所提問／關切的問題。反之，我的問題是有關我們對於實體和真理的知覺：我們如何知曉、如何傾聽、如何觀看和我們如何言說。我關切的是聲音和人際關係。同時，我想理解的是有關心理學和理論的過程，特別是男人在其中的經驗代表了所有人類的經驗——那些遮蔽女人的生命／活並關閉女人聲音的理論。我見到了以維持這些觀看和敘述人們生活／命的方式，男人排除了女人，但女人卻遺棄自己。用心理學過程的術語說，對於男人而言的一個分離／裂的過程，女人則需



製造一個內在區分或精神分裂的失聯。

這些事物並不是我天真的在做憑空抽象的思考。我的研究是植基在傾聽。我挑揀出那些在男人和女人聲音中那些失聯和失調的部分／音節。我開始懷疑：為何男人在談到他們和他們的生活／命時，或者更一般性的在談論人性時，常常像是他們和女人沒有瓜葛，好像女人並非他們的一個部分。我同時也質疑：為何女人在說到自己時好像是無私無我的，好像她們沉寂無聲或者從沒感受到自己的需欲？女人發現要無私無我意味著和人際關係的斬斷是個革命性的創見，因為那挑戰了由父權或文明所生／製造的在女人之內和由女人所生的失聯。這些以愛或人際關係為名所做的證成，等同於在道德的名義下所產生的違規和暴力的合法化。

在抗拒這些證詞的不同語音是個關係的聲音：一個堅持要連結及尤其重要的是保持和女人的連結的要求，如此那長久以來被以自治／主、自我和自由為名來驗證為合法心理學上的分離，再也不被視為是人類發展上顛仆不破的真理，反而被當成是個人的問題。

對別人有反應與她／他人一體行動，以及顧慮旁人的感覺、情緒和思考而非漠不關心。我在我逼迫她們自責、自棄和自我否認的強大勢力並陳時，我詢問女人為何同理心和體貼是好的，對自己有反應就是一種自私？許多女人回答：「真是個好問題／問得好」。當我在哈佛和艾瑞克森及寇薄（Lawrence Kohlberg）一起研習並在心理學中講授佛洛伊德（Freud）和皮亞傑（Piaget）的傳統觀點時，課堂中有許多女人會以慧點挑戰／質疑主題中基礎邏輯的方式提問。現在憶及這些片刻，我也能聽到我自己內在



分裂的聲音，我對女人說：「那是個很好的問題」然後加上「但那和我們的討論無關」。

在問到我自己和其他女人對於我們的關係為什麼是如此長久的缺乏自我反思時，我也詢問男人們和這一個我們的關係。難道在《奧德賽》（*Odyssey*）、《伊里亞德》（*Iliad*）或者其他版本英雄傳說——有關激烈的分離和暴力的故事——是男人用來訴說他們自己的典型的故事嗎？有關於人們生活最基礎的問題——我們如何生活和做些什麼事——是有關於人類／際關係最根本的問題，因為人們的生活是緊密地在心理上、經濟上和政治上連在一起的。重新架構這些問題並且讓這些關係的現實清楚明白——如何以與在和她／他人的人際關係中存／生活，怎麼面對衝突——我發現我聽到了女人和男人不同的聲音。突然之間女人的聲音變得很有道理且女人對於面對／解決衝突的徑路往往發人深省，因為她們不斷地關心如何維繫人際關係並保持人與人之間的連結。由於對人際關係的顧慮使得女人的聲音顯得不同，在一個充斥著／專注在分離和病態的執著於創造和維繫人和人之間疆界的世界裡——就如在佛斯特（Robert Frost）詩中的新英格蘭人所說的**紮實的籬笆創造好的鄰居**。然而，在當我開始書寫時對於人際關係的關懷在相當程度之內被視為是**女人的問題**。

在美國社會的情境當中，分離、自治和獨立是如此歷史悠久地被建立起來，而且被一波波的移民潮所強化是紮根在自然權力論的傳統中以致它們幾乎不假思索的被當成是既有的事實：人們的本性傾向分離、獨立於她／他人之外且自我管理的。質疑這些事實好像是在懷疑（否定）自由的價值，然而並非如此。對於分